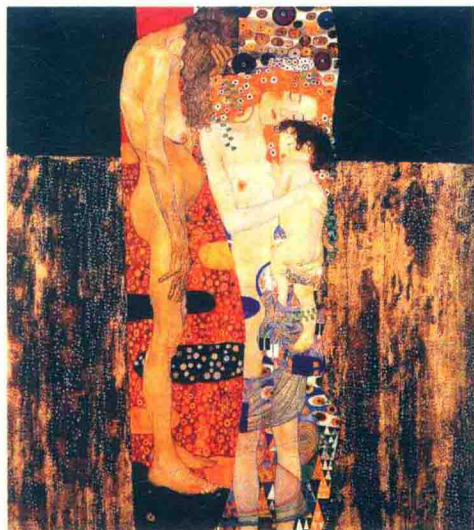




女性书写文化

Women Writing Culture

【美】露丝·贝哈(Ruth Behar) 著
德博拉·A·戈登(Deborah A. Gordon)
施旻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女性书写文化

Women Writing Culture

【美】露丝·贝哈(Ruth Behar) 著
德博拉·A. 戈登(Deborah A. Gordon)
施旻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自传、小说、历史分析、实验性文章,以及评论性文字等,为我们反思性别政治、种族历史以及写作文化中的道德两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全书共分四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包括短篇小说、实验话剧和个人日记,作者以亲身经历表达了女性人类学者在事业、家庭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第二部分是对人类学经典作品和对知名学者的重读与全新发现,这里既有《菊与剑》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又有对《紫颜色》的作者艾丽丝·沃克的书写政治的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被边缘化了的另类文化的发掘与书写;第四部分收录了流散中的中国女性的故事,她们痛苦地挣扎于家庭与异国文化之间,最终依靠个人觉醒与奋斗赢得各自的幸福与自由。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本书既是对男权中心文化的一次清理和批判,又是对女性文化的一种彰显。

本书是从事女性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也适合一切关注女性问题和边缘群体的广大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书写文化/(美)露丝·贝哈(Ruth Behar),(美)德博拉·A.戈登(Deborah A. Gordon)著,施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19498-5

I. ①女… II. ①露…②德…③施…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8526 号

© 1995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7-963

女性书写文化

著 者:【美】露丝·贝哈(Ruth Behar)
德博拉·A.戈登(Deborah A. Gordon)

译 者:施旻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制: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302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9498-5/I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1011198

译者前言

女性可以写作吗？她们能够写作吗？答案在当今的时代已经不言而喻。那么，女性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吗？她们的写作有特别的价值吗？可以有，但是大凡有价值的女性写作似乎都是对男人写作的模仿罢了。伊莱恩·肖瓦尔特早在半个世纪前就以女性批评(Gynocritic)解构了女性写作的“模仿说”与“对抗说”，并以女性亚文化写作状态开启了对“她们自己的文学”寻找的历程。无独有偶，法国女性批评家埃莱娜·西苏也以极富象征意味的“白色写作”(milk)来消解“黑色写作”(ink)的单一性，并以此来彰显女性写作的独特意蕴与丰富内涵。在当今文化日趋多元的时代，是到了不再将女性写作文化视为亚文化或次文化状态的时候了。《女性书写文化》真切地代表了女性自己的叙事风格，这种一直被“他者化了”的叙写文化，有其自身强烈的主体性，也完全可以成为其他文化模仿的对象。

根据此书的编者贝哈在“序言”中所言，她曾经被一幅画作深深吸引，并引发她的思考，成为编写本书的巨大驱动力。画面是一位手握铅笔、袒露着胸部的女子，这让她联想到在人类学史上，总是那些另类女人，或者某些地方的土著妇女，那些不能执笔写作的女人，西部和南部非洲的妇女，来自巴厘岛的女人，还有那些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女人，才肯裸露她们的双乳。此时的她们，乳房可以供人观看，暴露在外，被人拍照，带回家中，并印

在书里。而在本书的编者露丝·贝哈眼里,那些女性人类学家,也就是那些书写女性自己文化的人,她们虽然也拥有自己的乳房,但是她们却要将自己的乳房掩盖在笔和纸的背后。她们认为,自己的乳房无关紧要,别人是看不见的,就连癌变的脚步也追不上它们,男人的目光也不会对它们造成猥亵。贝哈不无讽刺地提醒女性写作者说,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还记得那些前卫女艺术家“游击队员女孩”曾经告诉西方艺术界的话吗?只有那些裸露双乳的女人,才可以使自己跻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可以说,西苏“白色写作”(乳汁写作)的深刻寓意,恰好从正面诠释了这位裸胸女性执笔者。女性人类学家带着一种女性观察者特有的、敏锐的、直觉的、目不转睛的目光来看这个世界,但她并不一定知晓,在她身后已经汇聚了汪洋一般的目光。当一个女人坐下来写点什么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她。任何一位试图将外部世界纳入自己视线的女人,她本人注定会成为别人盯视的目标。女人,最初的他者,总是逃脱不了要么被人观看,要么被人忽略的命运。女人看见了自己的被看,她一边握住铅笔,一边在想:那些“清规戒律”会如何来规约她想从事的写作呢?是否会被认为是男人所做工作的派生?或者太过女性化了?太冒风险了?太严肃了?或太不严肃了呢?许多目光汇聚在她身上,期待着看她能比男人做得更好还是更糟,或者是否能与其他女人做得一样好。总之,打算写作的她顾虑重重,十分忧郁。

我们必须诗意般地对待投射在这个女人背后的目光,也包括她自己的那双眼睛。那是她曾经的旅途见闻和返乡后的感受。它们代表了她在不同的逗留之地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每只眼睛看她的角度都略有不同。当她坐下来写作的时候,她就褪去了她曾经扮演的那些角色的外衣,在她思索着生命并且将思绪诉诸笔端的时候,她让阅历所形成的目光直泻而下。

此书的编写者贝哈作为一名出生在古巴,穿梭于波多黎各和纽约城的艺术家,她想找到一条既能界定自己又能模糊自己的途径。她说,她并非想要对自己归类,她心目中的女子大约是一位星光蓝加紫色的、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女人吧。她的头发略带一些彩虹般的幻彩色调,就像开屏的雌雄同体的孔雀,是多种颜色的混合——蓝、粉、紫、黄、白、黑。在女人的背后,太阳已经落下,月亮升起来了。一个岛屿的尽头,一处未知的乡间,在远处依稀可见。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女子大概就生活在这样一幅日暮乡间的美好图景之中。

与女艺术家群体一样,对女人类学家角色的争议和评论一直不绝于耳。她身

后目光的海洋表明了人们对女性看世界的不同方式的期待,以及女性主动接受这样一种混杂的视线,此时的女性并不想就此逃离。当女人的目光向外看的时候,投射在女人背后的海洋一般的目光也就不再可怕了。的确,所有的目光都指向了我们,但我们并不惧怕回头看,也不惧怕提出一种不同视角的人类学,人类学“将如何”“为了谁”和“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踏上旅程又返回到书桌前,或者是来到电脑前,在这种论争中,女性的写作已经被置于舞台的中央。虽然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故事皆得益于另外一个地方某一位当地妇女的活生生的生活经历。身为女性译者,在整部书译介过程中,可以说是“身临其境”地体验了每一位书写者时而低沉、时而激扬的人生境遇,又好似在与每一位书写者娓娓而谈,其中的感悟往往是痛彻心扉的。与此同时,也似乎为身为女性的自己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于冥冥之中找到了某种启迪与突困的路径。

不得不说本书的美编在选用奥地利象征主义画派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的画作《女人的三个阶段》时,用心是多么良苦。可以说,这幅油画极好地诠释了女人命运的三部曲。背景恰如张爱玲所言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而画面则是女人一生从幼年、青年,再到老年的真实写照:幼年的无助,青年的忧郁,老年的无奈。画面的悲凉感油然而生,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一生不可逆转的一种宿命吧!所幸的是,本书的女性手中握有一只写作的笔,她们毕竟能够以写作来拯救自己,来抗拒生之痛楚,这带给我们些许安慰。

在文化多元、书写风格多变的时代,阅读这些来自异域的女性书写者的独特文字,反思并审视她们的境遇,令我们或唏嘘或赞叹,却无一不是长久以来罹患失语症的我们内心深处意欲发出的声音,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宣泄”(catharsis),读后或许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恬淡与悠然吧。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胡开宝院长、彭青龙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也得益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杨迎春等编辑的悉心审阅与指导。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本书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以及译者主持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为17BWW050)基金资助。

译者 施旻

2018年3月于上海

前言

可以说,此文集是在我们与三个单词的含义之间所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措辞犀利的对话,这三个单词就是书名中出现的“女人”“书写”和“文化”。尽管是有着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感知力的学者或教师,但是出于我们对女性主义、写作和人类学等相关问题的共同好奇,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展开了远距离的友谊和大学之间的联系。在男性统治根深蒂固的人类学学科,一个女性人类学写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人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女性人类学家的写作之后,又能怎样改变人类学的历史呢?有没有独特的女性主义者的人种学实践呢?如果有,那么这个女性主义人种学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人类学、80年代的性别分析学又有何区别呢?

露丝·贝哈(Ruth Behar)最先提出了本书的设想,源于她1991年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研讨班策划和教授的题目为“女性写作文化:20世纪美国女性人类学家”的课程。除授课外,贝哈还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准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女性写作文化:人类学和他者的声音”。会上,德博拉·A.戈登(Deborah A. Gordon)是主旨发言人之一。这次密歇根会议更加激起了贝哈对这一主题的热情,她决定推出这本著作。

德博拉·A.戈登的先锋作品《书写文化,书写女性主义》,是早期女性主义者对《写作文化》(Writing Culture)这部文集的批评,贝哈对此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便诚邀德

博拉·A. 戈登共同编写这卷论文集。于是,为了在安·阿伯(Ann Arbon)和威奇托(Wichita)之间架起旅行、电话、传真的沟通桥梁,我们继续着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澄清了相互之间在此项目中的不同利害关系。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独特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女性主义人种学者贝哈和一个女性主义人类学史学家戈登之间珠联璧合的文集。《女性书写文化》是我们之间对话的产物,它既向我们展示了别样的人类学故事的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别样的人类学视角,正等待我们去创作、去描绘它的过去和现在。

在与供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论文集的雏形开始显现,我们把人类学重新定位于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所有的论文,抑或那些跨越国界的论文,都与目前在美国发生的、对认同和差异这一困惑的论辩相关。《女性书写文化》(*Women Writing Culture*)回应了西方文化经典和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在众说纷纭的讨论中的相关性。

我们要求投稿作品的主题是关于女性、创作以及文化的,但还是收到了为数不少其他方面的作品,从自传、历史杂文,到小说、戏剧、回忆录、旅行见闻、理论反思及文学评论等。这些作品超越了学术论文常规的表现形式,探求更加大胆的表达方式,《女性书写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视野下的20世纪写作文化的两难境况。本书的撰稿者并没有感到创作范式的枯竭,她/他们采用了多种创作形式去表现敏感的种族历史话题、性政治和人类学的道德困境,坚定了她/他们的创作自信。我们认为,那些依旧在思考文化表现困境的人,本书将不可能不让他们看到女性在她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所起到的中心作用。我们用大胆和凄楚的话语,试图将人类学推向暴风骤雨正急的多元文化主义讨论的海洋中。在此境况下,美国能让女性主义走多远,是极为不确定的。

作为编者,我们首先感谢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在写作和修改文章的过程中,他们积极合作,付出了耐心和辛勤的劳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纳米·施耐德(Naomi Schneider)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敏锐的指导和鼓励。我们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那些不知名的审核者致以真诚的谢意,一并感谢的还有编委会成员本杰明·奥利弗(Benjamin Orlove)先生,正是他们建设性的建议和热情的支持,才有了本书的最终完成。

德博拉·A. 戈登感谢威奇托州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中心的玛丽安·舒济(Marian Chuzy)研究基金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女性研究中心的同事盖尔·戴维斯(Gayle Davis)、卡洛尔·科奈克(Carol Konek)

和多萝西·米勒(Dorothy Miller),在本书初始阶段提供了支持性的工作。苏·威尔柯克斯(Sue Wilcox)在编辑过程中提供了管理上的帮助,负责传真和打印文章。她的幽默感帮助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度过了一些有压力的时段,并使本书的内容如此充实。另外,理论写作和阅读小组的同事罗杰·伯杰(Roger Berger)、史蒂芬·莫尔(Stephen Moore)、哈罗德·威瑟(Harold Veaser)和南希·威斯特(Nancy West)提供了富有知识性和启发性的背景知识,我们在书中将要讨论。他们阅读了我的文章的草稿,更重要的是,让我觉得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威奇塔州立大学1994年—1995年春季学期“性别、种族和知识”研讨课上的学生,对我在课堂上提出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观点做出了回应。感谢汤姆·德·利洛(Tom De Lillo)在最后编辑过程中的支持和建议。最后要感谢露丝,感谢她富有情感和智识的支持。

露丝·贝哈感谢所有密歇根大学“女性书写文化”课堂上的研究生们,本书的观点是第一次在这里被清晰响亮地表达出来的。在“女性写作文化”研讨会上,我的同事卡洛尔·卡尔森(Carol Karlsen)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人类学评论》编委会的维勒穆·德·布勒克特(Willem De Blecourt),使本书得以在1993年12月的特刊上,做了一次尝试性的预演。在那些支持我们工作的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中,我特别想感谢布鲁斯·曼海姆(Bruce Mannheim)、格雷西亚·克拉克(Gracia Clark)、艾比·斯图亚特(Abby Stewart)、雪梨·奥特纳(Sherry Ortner)和我的写作组的成员琼·莱昂纳德(Joanne Leonard)、朱利·艾利森(Julie Ellison)、帕特西·耶格(Patsy Yaeger)以及安·吉尔(Anne Gere)。感谢雷切尔·科恩(Rachael Cohen)、吉姆·根尼斯(Kim Gaines)和埃米·麦克唐纳(Amy McDonald)所做的编辑和整理工作。感谢大卫·弗莱(David Frye)的帮助,使我杂乱的计算机文件变得有序。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儿子盖博里尔(Gabriel),感谢他的关心和理解。还要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不止一次地支持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从教学转移到写作和编辑这本书上来。最后,谢谢德比(Debbie)的信任和帮助,以及我从未想象到的姐妹情谊。

露丝·贝哈和德博拉·A.戈登

1994年12月12日于安阿伯和威奇托

目 录

导言 超越放逐	露丝·贝哈	1
---------	-------	---

第一部分

超越自我和他者	33
---------	----

第一章 参与者的观察	吉润·娜拉延	35
------------	--------	----

第二章 坏女孩：戏剧、有色妇女以及表述的政治	多琳·孔多	52
------------------------	-------	----

第三章 以我父亲的名义写作：记《转变的女人》出版一年	露丝·贝哈	70
----------------------------	-------	----

第二部分

另一种历史 另一种经典	91
-------------	----

第四章 “拒绝对单一”：重读露丝·本尼迪克特	芭芭拉·A. 巴伯考克	93
------------------------	-------------	----

第五章 埃拉·凯洛·德洛丽亚与莫宁·德弗：为文化而书，不为常理而作	詹妮特·L. 芬	120
-----------------------------------	----------	-----

第六章 违反常理的写作：爱丽丝·沃克作品中文化政治的差异	法耶·V. 哈里森	138
------------------------------	-----------	-----

第三部分

人类学有性别吗 151

第七章 理论的社会性别 凯瑟琳·拉兹 153

第八章 女士的表述：对学术界男性研究的
反思 朱迪斯·牛顿与朱迪斯·斯泰西 170

第九章 书写女同性恋人种学 艾伦·勒温 189

第四部分

旅行中的女性主义者 203

第十章 两次怀孕的故事 里拉·阿卜-鲁格德 205

第十一章 来自中国的女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
旅行故事和旅行理论 王爱华 217

第十二章 边缘工作：女性主义人种学及读写能力的
普及 德博拉·A. 戈登 241

结论

文化书写着女性：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而题
德博拉·A. 戈登 258

导言 超越放逐

露丝·贝哈

一个女人只要她写的是些小随笔,就没有人反对她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1928年

不要让思想不留姓名就溜掉,而是要像官方注册外国人那样,严格地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沃尔特·本雅明,《单行道》,1928年

在《写作文化》和《这座桥就是我的脊梁》的岔路上

这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对人类学危机和女性主义危机这两个批评对象在80年代分别登场时的一个回应^①。这个双重危机就像两条注定不相交的平行线,但本书却意在使它们相交。该书出自人类学内部的一个批评对象,即后现代主义或文本主义批评。人类历史学者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和人类学家兼人种论写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批评者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编辑的文集《写作文化:诗学与人种学政治》(*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logy*)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此书是位于新墨西哥圣菲(Santa Fe)的美国

^① 这种双重危机已经引发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思考。参见 Lila Abu-Lughod,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 and Performa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1900(5): 7-27.

研究院“高级研讨班”上的结晶^①。

另一个对象来源于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妇女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批评。它们来自学院派外部,但通过《这座桥就是我的脊梁》(*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一书进入妇女研究的主流。此书由女同性恋诗歌批评家切里·默拉伽(Cherrie Moraga)和格洛里亚·安扎杜阿(Gloria Anzaldua)编辑而成^②。她们没有终身学术职位,出书时还要担心房租,书中她们鼓励那些自认为还不是作家的有色人种妇女赶快参与进来。此时,《写作文化》一书正好进入学术领域,《这座桥就是我的脊梁》一书,是对那个封闭领域的一个挑战。

相关的女编辑和关注此项工作的一位好心肠的男性人类学家都提醒我说,应当强调《女性书写文化》是一项全新的、卓越的事业,完全是原创性的,与《写作文化》一书毫无关系,他本人曾参与了《写作文化》一书。否则,他们说我们的书有被视为派生物而被(男人)扫地出门的危险——现在我们从女人那里得到了同样陈旧的东西。我很感激这种建议,但是我愿意斗胆宣称《写作文化》一书是我们这项女性主义工程的一个主要前身。

1986年出版那样一本文集,即刻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化代言者的论争,震撼了北美人类学界,为这门学科带来了全新的自我认识。即使是那些批评《写作文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的重要性而认真给予该书应有的关注^③。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提出一种十分显见的观点:就是人类学家在写作;而且更进一步讲,他们所写的,也就是人种论——在现实主义小说、游记、回忆录和科学报告之间的奇怪的混合——需要置于诗学和政治学框架内加以理解。在这样一个学科里,一向挤满了诸如名声在外的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埃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等文学界的“不学无术的妒忌者”们(wannabes),他们把自己的诗歌藏匿起来,避开了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老人(Papa Franz Baos)那警惕的目光,

①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这里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此书出自一个“高级研讨班”是引人注目的;“高级”一词在前言的首页出现了三次。更多背景知识,参见 George 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II): 25-69.

② Cherrie Moran and Gloria Anzaldu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③ 参见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ichard Fox, eds.,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 Mex.: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写作文化》一书销量很好,达 25 000 册,这在大学出版社学术类出版物中鲜见。

但这并不表明一场地震在发生^①。但是以往却从未有人类学界的文辞经历过如此尖锐和复杂的文本分析,它扑灭了有关人种学是文化明镜这一假想的一切余火。书的撰稿人质疑这样一种诗学政治,那就是依赖他人的文字而生存,却并不为他人提供著作者的权益,而这些人参与了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书写^②。

玛丽·路易斯·普莱特(Mary Louise Pratt),这本文集特立独行的女撰稿人,也是一位文学批评者,只有她敢于大胆怀疑能被编入人类学者写的书籍中“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她带着学科之外人士的自由,曾调皮地质问人类学家:你们是怎样一群兴致勃勃的人,在做着妙趣横生的事,怎么竟会写出如此乏味的书呢^③?

詹姆士·克里夫德(James Clifford)在《写作文化》的序言中,试图回答普莱特恶魔般但的确重要的提问。他认为人类学需要鼓励更多的创新、对话、反思和实验性写作。同时,应期待“新人种学”在文本和世界中反映出对权势更为深远的自我意识,以及一切真理具有的偏颇性。“新人种学”并不能解决那些由全球资本主义所引燃的深刻的不平等棘手的问题,但至少是在努力对体现在“他者”(the Other)身上的那些固有的权力关系去殖民化^④。《写作文化》的日程表承诺要更新人类学摇摆不定的目标。

然而,女性人类学家和女性人类学写作在这个日程表上是缺席的。伟大的20世纪曾经有一个革命性计划,就是承诺有朝一日要解决“妇女问题”。《写作文化》无疑是它缩小了的一个版本,它让妇女“要有耐心,要理解……她们的需要——由

① 关于 Sapir 与 Benedict 在智力与诗学方面的交流与矛盾,参见 Richard Handler, “Vigorous Male and Aspiring Female: Poetry,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in Edward Sapir and Ruth Benedict”, in *Malinowski, Rivers, Benedict and Others: Essays o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eds. George W. Stocking, J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127-155.

② 我认识到封闭的仓储式的归纳总结中,我给予《写作文化》的是立于—尊的文本形象。正如许多读者指出的那样,书中的作者有显著的差异。例如,塔德尔·阿塞德(Talal Asad)的文章没有涉及文本理论;迈克尔·菲切尔(Michael Fischer)的文章集中在种族自传,而不是人种学;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的文章批评了对文本形式的占有,并在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之间寻求一种不自然的联盟,与詹姆士·克里夫德形成了一种敌对立场。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但这部著作并非谈话形式的文集,而是有计划的专题论文,唤起了人类学家更加注意他们的文学基础。这本书继续在克里夫德“引言”的过滤下被人阅读,着重强调了文本形式和理论,所以,以读者反映为时尚,也是我所强调的一个方面。

③ Mary Louise Pratt,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Writing Culture*, 33.

④ 参见 George E. Marcus 和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在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p. 9) 的引言里, Richard Fox 批评了那些误解权利的本质的文本主义方法,因为他们支持作为技艺的人类学写作,而不是遵循“工业原则”。

于考虑到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顶点的。^①”由于这种无知行为是经过正式认可的，所以，新人种学并没有考虑女性在整个 20 世纪已经跨越了人类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但通常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就像外国人的作品常常被看做是“忏悔”和“流行”，或者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说是“小随笔”，道理是一样的。《写作文化》的议程孕育在一群男学者与另一群男学者之间同性恋式的学术话语之中，认为女性并未跨入这种边界，即使个人的声音，一经女性发出，也要得到男性的人种论的认可，符合一种在学术上常用的字眼，诸如“反思性的”和“实验性的”^②。

不足为奇，《写作文化》一书让女性人类学者既感悲哀又怒火中烧。在人类学写作历史上，从未有像詹姆士·克里夫德那两页令人颇感不适的陈词那样激起如此巨大的愤怒了，他在为女性从《写作文化》中的缺席而辩护。迫于那些来自已经读过此书手稿的女性主义读者的批评，克里夫德做出了现在看来臭名昭著的声明，他说女性人类学家之所以未包含其中，就是因为她们的写作未能满足文本创新的需要^③。他认为身为女人又去书写文化，在用语上就是矛盾的：那些采取实验性写作的女性，不足以称其为女性主义者，而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的女性写作时又忽略了支持她们文本的理论。

第一位对上述观点做出回应的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是德博拉·A. 戈登，也是本书的合作编者，她认为，“对待‘实验性’人种学权威的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在一种男性主观基础上的，一方面鼓励女性主义者与新人种论模式寻找认同，声称去殖民化，与此同时，又将女性主义降到一种卑微的、局促的境地”。她强调说，《写作文化》中的文章并非恶意，它们只是象征着“男人在对女性主义问题谈判沟通

① Slavenka Draculic, *How We Survived Communism and Even Laughe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46-47).

② 例如, Paul Rabinow, *The Field 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Vincent Crapanzano,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被认为是试验人种学的原创性事例, 尽管它们显然是建立在女人写作的传统上, 包括 Laura Bohannan, *Return to Laugh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初版为 1954), 以及 Jean Biggs, *Never in Ang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奇怪的是, 在《写作文化》中详细讨论的唯一一个女性人种学文本就是 Marjorie Shostak 的 *Nisa: The Life and Works of a !Kung Wo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1), 由一位参加了哈佛卡拉哈里项目的人类学者的妻子所作的生活史, 对田野工作生动的个人讲述, 成为人类学的入门课。

③ 参见 James Clifford, *Writing Culture* 的导言部分, 21-22, 他声称, 那些曾经做过文本革新的女人类学者“并没有在女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 她们“在积极地重写男人特色的经典”, 既没有“创作出反常规的写作形式, 也没有充分地反映人种学文本”。

上的无效性管理”^①。紧随戈登的洞见,朱蒂斯·牛顿(Judith Newton)和朱蒂斯·斯泰西(Judith Stacey)在文章中宁可探索男人在女性主义内部自我定位时所经历的艰难——男人尽量避免在妇女主义的领地上做观光者,或更糟的是私闯者。

当然,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在《写作文化》和《女性书写文化》两书的论争中建立男女对立。正如约瑟夫·布恩(Joseph Boone)和迈克尔·凯登(Michael Cadden)所言,女性主义视野一直包括男人,是弃绝了“男性目光”并学会用性别术语来“重新审视”现实,而不是通过一种超验者的“我/眼光”来进行想象^②。事实上,《写作文化》的确刺伤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核心,将其贬损为乏味的、无可救药的重复与累赘,只不过是那种事实——找寻(fact-finding)的营生而已——既然如此,请告诉我们,难道这些女性与那些小鼓号手们有什么天壤之别吗?就像凯瑟琳·拉兹(Catherine Lutz)在文章中所言,曾经困扰女性的压力现在已经转移到写作上了,的确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自此以后,我们当中带着写作梦想而涉足人类学的人,以及那些因为不具有分析能力而不得不剪掉羽翼的人,她们热情地拿起了笔,再也不用像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一样把她创作的诗歌隐藏在床下,再也不需要隐匿起她们洞见的火花。事实上《写作文化》一书是一种无言的解放,因为我们无法失去这样一种反讽:人类学再生了一种通常的权力关系构架,在这种社会性别的等级构架中,男同事们继续从总体上操纵着学术和社会。是他们解放了我们,作为女性,正是因为我们被“解放了”,才得以更富创造力地、更为自觉地,也更为专注地书写着文化。

若不是因为《写作文化》中女性的缺席,这本书的讽刺效果也许不会出现。就像《女人、文化和社会》(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这样一部 20 世纪 70 年代女

① Deborah Gordon, “Writing Culture, Writing Feminism: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nscriptions* 3/4(1988)“书写文化,书写女性主义: 试验人种学的诗学和政治”《3/4 题词》。其他反响如下,包括 Frances Mascia-Lees, Patricia Sharp 和 Colleen Ballerino Cohen“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来自女性主义层面的警示”“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符号》(Signs), 1989(15): 7-33; Margery Wolf,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arbara Babcock, “Feminism/Pretexts: Fragments, Questions, and Reflection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6, 1993(2): 59-66.

② Joseph A. Boone and Michael Cadden, eds., *Engendering Men: The Question of Male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

性主义先驱里程碑式的文集一样,被盗用后转化为人类学经典之作《男人、文化与社会》(*Man, Culture and Society*),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对《写作文化》做出重申的^①。20多年以前,阿德莱恩·里奇(Adrienne Rich)主张在选材、主题和语言上,男作家不要为女人而写作,也不要带着一种女性批评的意识。而女作家,即使她们面对女性,也是为了男人而写作的;或至少她们是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能让男人偷听到的感觉去写,当然就带着一种被男人的话语所界定了的、摆脱不掉的意识。这也就是为什么“重新审视”,即“从一种全新的批评视角进入旧文本”的做法,对于女性来说这是“生存的法则……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写作……不是为了继承一种传统,而是为了摆脱它对我们的控制”^②。

一直保持一种回应的状态是令人疲惫的,这也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要经常扮演的角色。幸运的是,尽管这本书一开始是女性主义者对《写作文化》的回应,但它逐渐变得更为广泛。本书开启了另外一种叙事议程,它的包容性、创新性,实践与历史的结合,它的幽默、哀婉,它的民主政治,它对人种和伦理以及文化的关注,它的社会性别自觉,它对作为知识工厂的学术的意识,它的梦想等诸多方面,超越了《写作文化》。女性主义者的重新审视,总是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看待所有的内容,不仅是看待“女人”。收录的文章再现了另外一种历史,及人类学的另一种未来,而不久前(甚至是现在)人类学还是一种知识追求,被界定为“男人”的研究。

如果《写作文化》对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影响是激起了她们胸中的怒火,那么《这座桥就是我的脊梁》一书(简称《这座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感到卑微了许多,让我们在前进的轨道上止步不前。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做研究生或助教的时候就读过《这座桥》,但是我们国家在有色人种妇女教育方面有些延迟,人类学方面的教育更是早就被忽视了。即使人类学训练使我们怀疑这一术语的局限,我们很多人也认识到了身为“有色人种妇女”这一身份。正如保拉·埃布隆(Paulla Ebron)和安娜·卢温豪特·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本书中的观点,《这座桥》带给

①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Harry Lionel Shapiro, *Ma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Writing Culture* 可以说是对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一书做出的男性主义的回应。这种政治与历史的复杂性在本书德博拉·A. 戈登的结论部分得以充分探究。

② Adrienne Rich, “When We Dead Awaken: Writing as Re-Vision”, 在她的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 (New York: Norton, 1979), 35-38.